

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江阴名人自述

下

—— 朱穆之
解放战争开始，我被任为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特派记者，我非常高兴又能够做我一向往往的新闻工作。

—— 滕 藤
我在清华学习、工作了三十七年，而且正好是我的青年和壮年时期，所以这是我最眷恋的年华。

—— 曹 鹏
江阴民风敦厚、纯朴，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我的音乐事业是在江阴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培育起来的。

● 沈俊鸿 编

江陰文史叢書

江陰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 編

江陰名人自述

下

沈俊鴻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兆洪

吴兆洪(1911—1979),字季玄,江阴顾山人。1928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31年冬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毕业,由钱昌照推荐为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筹备处科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工作出色,晋升为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被提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多次参加重大外交活动,曾两度随兼外长宋子文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议军援和外蒙古问题,并参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后又随宋子文赴旧金山参加筹组联合国会议,任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淮海战役后,接受资源委员会财务处长季树农的策励,参与上海中共地下党活动,并与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一起,采取应变策略,率领资源委员会下属大陆全部企业1000余单位和全体职员3万余人,工人数十万人,坚守岗位,拒绝南迁。于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将资源委员会全部人员、物资、档案、外汇移交给人民政府,对解放初期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受到中共中央的明令奖励和陈毅市长的热情鼓励。建国后,历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并选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我留在大陆的经过

197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回忆三十年前在

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人员,决心弃暗投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投向共产党,迎接解放的经过,特别是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在接管时亲临讲话,对我们谆谆教诲、热情鼓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终生难忘。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最主要的工矿企业管理机构,垄断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包括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机械、电机、电力、化工、造纸、制糖等一系列工矿部门。除内蒙、宁夏、西藏外,全国各省市都有它的附属企业,职工人数共三十多万人。

淮海战役像一声春雷,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极大的震动,引起内部一片混乱。1948年12月,继翁文灏充当伪行政院长的孙科,上台后不久就准备迁逃广州。资源委员会是伪行政院直属机构之一,面临这种情况,对于今后去路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多数人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跟随南迁,决心留在原地,等候解放。有的人坚持反动立场,准备死跟反动派,随同逃跑。还有一部分人对国民党已失去信任,但对共产党心怀疑惧,考虑个人得失,彷徨观望,举棋未定。我那时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起初听说翁文灏可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我到台湾还可有所依托,后来翁文灏并无下文,我去台湾能否保持原来地位,毫无把握。同时,瞻前顾后,感到进退两难。

正在这时,原资源委员会财务处长季树农(我的同乡,又是中学、大学同学,通过我的关系来资源委员会工作的)找我密谈,说他有个侄子季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最近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向他分析了国民党必然垮台、共产党一定胜利的形势,劝他不要去台湾,并说此时留在资源委员会工作岗位上,可以替

人民做许多事情；资源委员会这批人不走，将来共产党来了是不会有问题的，等等。我听了以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翻腾，感到除了跟随国民党逃跑，去做它的殉葬品以外，还有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我去找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把季树农转告的话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早已看到南京政府一定要垮台，也就认为台湾去不得，你想这么多的国民党大员跑到台湾去，对资源委员会手下的那些工矿企业谁不眼红，还能让你保牢这个小天下吗？何况台湾也并不保险。”他还说，他曾反复考虑过，只有投向共产党一条出路。在这次谈话中，我吐露了打算与资委会人员一起留下投共产党的意图，他表示支持。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南京五个厂的问题。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孙越琦，面令他将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电泡、有线电、无线电、电瓷和马鞍山工具机等五个厂拆迁台湾。到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时，工具机厂的机器已经装上了船，其他四个厂的机器也拆运到南京码头。我向孙越琦提出，我和资委会人员既然留下不走，而南京的工厂迁往台湾，共产党来了，不好交代，建议停止拆迁，孙完全同意。于是我们借口“李代总统”已宣布国共即将进行和谈，时局变化，下令四厂将机器即日搬回原处，复工生产，工具机厂机器运抵上海后也不再外运。不料电泡厂有个职员是蒋介石亲信俞济时的亲戚，他一心想去台湾，见工厂还迁，向俞报告。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随即行文资源委员会查询原委，经孙越崎向李宗仁打了招呼，并将俞的亲戚调往台糖公司工作，满足了他的逃台愿望，才把这件事搪塞过去。虽然中间经过一些周折，总算把五个厂的设备和人员

保存了下来。

一月下旬,伪行政院正式迁往广州。孙越崎和我(季树农也参加)作了以下部署:由我率领资源委员会本部和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钢铁事业管理委员会等几个总管理机构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全部迁移上海,准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电业管理处处长陈中熙提出他和该处人员希望留在南京等待解放,我们即发表他为资源委员会南京办事处处长。其他会本部一般职工也留在南京,组织“南京员工励进会”照料他们的生活,由季树农推荐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财务处科员卢英立负责。同时,孙越崎与我进行了分工,他留在南京促进和谈,并通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曾任资源委员会参事),把资源委员会人员留待解放的打算转报党中央领导同志;我则去广州应付一下伪行政院。

一月底,我率领迁沪人员到了上海。二月初,将他们在沪的生活和工作大体上作了安排后,为解决伪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向台糖公司勒索巨款的问题,去台湾转了一下,就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想同中共领导同志取得直接联系,曾利用一个周末去香港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把资源委员会当时动态告诉了他,要求他介绍我和在香港的党的负责人见面。他对我们的部署很支持,但告诉我最近香港党组织决定暂不和国民党官员接触,我即回到广州。解放后听王说,当时第二天他就见到香港党的负责人,曾把我的话转告,负责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见面,但我已回广州,只得作罢。

三月初,我从广州飞回上海。当天,老同学黄肇兴(曾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那时在上海任建业银行总经理,该行董事长是龚饮冰同志)约我去他家吃饭。他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托,探

询我的态度,并说一月底上海地下党就准备和我联系。两天后,我在黄家与地下党戴崇义同志见面,他对资源委员会当时的安排表示赞许,并进一步向我说明党的政策,更坚定了我迎接解放的决心。他还代表地下党向我提出三点要求:(一)资委会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稳在上海不走;(二)资委会在上海的工厂不拆迁;(三)资委会和在沪所属各单位的器材尽量不外运。对于这三点,我都答应照办,还根据地下党需要,提供了资委会上海各厂和各仓库的地点、负责人等有关材料。当时国民党派了督运物资专员方治和雷震两人催逼各单位把器材运往台湾。我同他们避不见面,派秘书去参加他们召开的“督运会议”,尽量推托搪塞,结果只运出极少量不重要的器材。正在这时,台糖公司因产量增加,来电向我请示可否运三万吨糖来上海,我在取得孙越琦同意后复电照运。上海解放初期居民食糖供应基本上取决于此。还有中国油轮公司小油轮四艘,在解放前夕被迫凿沉,由于事先采取了措施,解放后得以完整地打捞起来修理使用。此外,资源委员会财务处在上海解放前夕,有意识地集中了所属单位积存的外汇美金五十多万元,在解放后移交接管。当时地下党为了我的安全,要我尽可能少作直接接触,有关情况随时通过黄肇兴转告。

三月中旬,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又一次改组,孙越琦任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由孙兼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四月下旬,过去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钱昌照从英国回到上海。孙越琦和我同他谈了我们准备迎接解放的部署,他甚表赞同。我们即约集资委会本部及在沪各企业负责人在钱的住所举行了一次聚会,孙越琦表示将去广州,上海由我负责,我表示当与资源委员会共始终,暗示将留沪不走。

这样,与会的人大都意识到资源委员会是不准备搬迁的了。次日钱去香港,与香港党取得联系后到了北京。孙去广州前对我说,他的官太大,以前又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反共文章,不能留在大陆,去广州后,打算辞职去香港。共产党到了上海后,希望我把他的苦衷向当局说明,如能得到谅解,要我立刻给他一信,他即回归。他还同我商量,对蒋管待解放区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企业发给必要的经费,使它们能维持职工生活和生产,直到解放。

五月上旬,其他国民党中央机关都已陆续撤离上海,只有资源委员会按兵不动,逐渐引起国民党注意。本来我们借口资委会是企业管理机关,为了维持所属企业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必须与金融机关密切联系,当时伪中央银行还在上海,因此资委会也只能留在上海。后来雷震在一次会议上向参加会议的资委会代表查问我走了没有?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长陈保泰也向他熟悉的一个资委会职员查问资委会何时迁广州?这时我感到如再不到广州走一趟,不但自己在上海呆不下去,就连资委会也很难继续留在上海,因此决定再次去一下广州。动身前一天,恰巧《新闻报》记者来采访,我即乘机放空气说,资源委员会日内迁广州,我本人次日即飞广州。第二天这个消息在报上登了出来,暂时稳住了局面。

我于五月十二日飞抵广州,到国民党政府的几个有关机关转了一下,使大家知道我已继孙越崎以后到了广州,资源委员会即日南迁。见了孙越崎,我怕他辞职后,继任者可能逼我离开上海,因此要求他尽可能在广州多呆几天,晚一点辞职,孙表示同意。三天后,我秘密折乘广州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避居在朋友家中一直到解放。孙越崎则在十八日辞职去港。后来,伪行政院发

表刘航琛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兴冲冲地到资源委员会在广州虚设的办公地点走马上任,结果除了一个秘书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大为恼火,但上海随即解放,他们已无可奈何了。

在上海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内,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般情绪稳定,只有个别在临近解放时逃往台湾。5月26日,苏州河以南市区解放,一清早,我就到资源大楼与市军管会重工业处的负责同志见了面。27日,上海全部解放。从此,长期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盘踞的上海,成为人民的上海,而国民党最主要的工矿企业管理机构资源委员会也走进了坟墓,人民的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里,广大资委会职工获得了新生。

5月29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举行了接管资源委员会的仪式。陈毅同志在百忙中亲临参加,给予原资委会人员以极大的鼓舞。曾山同志和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副处长程望、李文采等同志以及驻各厂的军代表参加了仪式。参加接管大会的原资委会各级干部和所属上海各企业负责人共两百多人。



吴兆洪

陈毅同志是解放后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身穿军装,神采奕奕,大气磅礴,而又诚恳坦率,平易近人,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陈毅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头就说:共产党接管国民党原来的各单位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国民党的一般党政军机关

必须摧毁其机构,主要人员一概不要,中下级人员分别量才留用,对资委会和所属人员则予重视。接着说:“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军事阶段结束后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深盼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往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人员,鄙视政治或者抱所谓‘超然态度’,那是不对的。因为建设的成果,必须看政治领导是否正确。以往的建设成果,为反动政府利用,技术人员不能发挥所长,今后的建设成果归于人民,技术人员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他又说:“共产党最尊重科学,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蒸汽时代,资本主义逐渐没落,社会主义兴起。到了原子时代,社会主义将加速发展。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这些建设人才不再像以往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广大人民服务,成为积极的建设战士。”

陈毅同志还讲到,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推迟爆发。全国解放后,将集中力量从事生产建设,相信五年到十年就可以在国内完全消灭失业现象,做到大家有饭吃,大家有工作做。世界历史将沿着我们所走的道路前进。

陈毅同志的讲话,向我们揭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灿烂前景,对技术人员给予了巨大鼓舞,并寄以殷切的期望,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普遍感到兴奋。一些原来对共产党怀有疑惧心情的人,豁然开朗,消除了顾虑,由衷地爱戴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会间,陈毅同志和我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谈到孙越崎时,陈毅同志说,孙是为事业而做官的,党可以谅解,并要我通知他即日

回国。还说,翁文灏是书生,即使他留在国内,我们也不会难为他。陈毅同志还殷殷垂询资源委员会人员的住所有未遇到麻烦。他说:如有麻烦,可以通知公安局。他对资源委员会人员这样关怀,使我深受感动。后来,孙越崎接到我的通知,在当年十月回到北京。翁文灏经过转报中央批准,于1951年初回国。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回顾当日我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排除阻碍,甘冒风险,留待解放,完全是党向我伸出挽救之手,动以大义,晓以利害的结果,也是我痛悟前非,弃暗投明,力图立功赎罪的表现。不料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颠倒黑白,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关押“审查”达四年之久,身心备受摧残。直到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真相大白,才使我得到昭雪,获得第二次解放。现在回忆三十年前的情景,真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

今年是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当年陈毅同志的讲话,不仅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建国前夕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规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进行新的长征,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仍然是鼓舞我们团结战斗的强大动力。我虽年近七十,患有重病,但有生之年,决心紧跟共产党,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竭尽微薄的力量。同时希望在台湾的旧日同事和朋友们,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认清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神圣使命,抓紧大好时机,共同为台湾早日归回,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原载《江阴文史资料》第九辑)

罗 琼

罗琼(1911—2006),江阴周庄人,原名徐寿娟。1932年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35年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各界妇女救国会,任该会理事、宣传部主任,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队政治教员。1940年调中央妇委工作,后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编辑主任。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后调山东解放区工作,任山东解放区妇联宣传部部长,后兼任山东大学合作专修科主任。1947年冬调西柏坡,在中央妇委工作,次年任中央妇委委员,筹备并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常委。后历任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全国妇联副秘书长,执委、常委、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全国妇联第四、五届副主席。曾任中共第七、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专著《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文集《妇女解放论丛》、《改革开放与妇女解放》、《苦难与抗争》、《罗琼文集》等,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启迪集》。

我的当兵生涯

1938年初,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崛起在江南战场上,驰骋在

扬子江头、黄海之滨,以自己铁的纪律和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的广泛信任和热烈拥护,到处传播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兵”的颂歌。江、浙、皖、沪一带热血青年和南洋爱国侨胞,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不怕特务的暗害,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涌向新四军。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穿上贴心的军装

1938年8月的一天,正是红日当空的中午,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了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队总队部,这是培养军事、政治、文化干部的熔炉。

接待我的是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龙树林同志。他那富有政治修养的谈吐,真挚纯朴的欢迎情意,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当时是27岁的青年,抱着为革命扎扎实实做一番事业的豪情,投向新四军,一致的情感使我们一见如故。

我住在董家祠堂的一间侧屋。房子虽旧,但床铺和桌子、洗脸盆、油灯等一应俱全,放得整齐,擦得干净。可以看出,同志们为我的到来已经打扫了一阵子,我心想这是为新兵如何整理内务作榜样。窗外,溪水潺潺绕墙而过,远处青山绿树,环境十分幽美,在大城市住惯“鸽子笼”,吸惯污浊空气的我,顿觉肺腑清爽,豁然开朗,心胸欢畅。

第二天,我便领到了一套新军装。手捧新军装,心情激动,思绪起伏,我暗自思忖:这是为革命建立了殊勋的铁的新四军的服装,是千百万战士、千百万人民用血汗交织的服装,我配穿这套军装吗?

正在这时,教导总队政治处宣传科科长邱一涵同志来看我。她是延安来的长征老干部,是越过千山万水又经过南征北

战的杰出女战士。她一见我就热情地拉住我的手,问路上的经过,问薛暮桥同志什么时候到来,问孩子们怎么安排的,等等。一面说,一面帮我换上新军装,教我打绑腿。当我穿上军装后,她又笑着对我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位既文雅又威武的革命军人!我说:当兵是我多年的愿望,穿着贴心的军装,满身是劲,只是我对革命贡献太少。

穿上军装,就是战士,要过军事生活。每天,起床号一吹,赶紧起床,整理内务。第一步要讲军容、军仪、军风纪。出门遇到同志,学着举手行军礼。开始,手总举不到帽檐上,只好又举手、又点头,搞得“四不像”。虽然同志们很谅解我,但自己总感到不安,于是在室内对着镜子练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终于学会了要领。



罗琼

大约两个星期后,全教导总队开全体军人大会。军部副总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同志来参加大会。他向我走来,我立正向他举手敬礼,他马上给我还礼,并叫我“稍息”。这位素以严肃闻名全军的首长,却微笑颌首,肯定了我这个新兵

的进步,并亲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又走到许多同志面前,问寒问暖。我亲身感受到了人民军队新型的官兵关系。

真心实意向老兵学习

我一直在教导总队当政治教员。最初在一二队任教。这

两个队是军事队，学员全是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红军的班、排干部，以培养连长为目标。

龙树林同志跟我谈话，要我先去那里教社会发展史，还说我可以有两三个星期的备课时间。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我第一次到部队，学员们斗争经历比我长，经验比我丰富，我能担负得起这任务吗？于是，我决定白天到部队去，向老兵学习，过军事生活；晚上、星期天，读书、写教案。我把这个计划报告给龙树林同志，他很迟疑，他说：“队里生活艰苦，学习又紧张，同老兵们共同生活，太劳累。”我说：“我应该锻炼自己，身体也能支持。”他才勉强同意。

从此，我每天早餐后步行三四里地，赶到一二队的驻地。上午他们上军事课：讲持久战，江南战场形势，新四军在江南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针等，我便跟大伙儿一块认真听课；下午，一般是操练、打靶，我就在场上观摩学习；晚上，有时大伙儿讨论，我也在旁边仔细地听。课间休息，学员们引吭高歌抗战歌曲，这个班喊，那个班唱，气氛热烈。

刚开始，我有些拘束，不过没过几天，便同大伙熟悉起来了。他们唱歌，我也跟着哼哼，他们休息，我们便天南地北地闲聊。他们问我在城市参加的活动，问我的家庭生活，我也问他们三年游击战的情况，问他们的老家情况……

在同老兵相处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革命当作生命，把共产党当作引路的恩人，把人民当作重生父母的革命精神；在那里感受到的是团结战斗的气氛；听到的是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革命誓言。他们原来都是贫苦农民，是土地革命中奋起的战士。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时，他们留在南方八省老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依靠群众的支援、掩护，在罗霄

山脉孤军奋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击败了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数次围困清剿,在风餐露宿、半饥半饱中坚持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有钢一般的斗志,铁一般的筋骨,真正是特殊材料铸成的英勇战士。

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接触,我学到了一些起码的军事常识和操练基本功。老兵们对我开始产生好感,认为我很少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又有一些文化、理论,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彼此有了信任,初步建立起同志式的感情。

重在引导学员树立和巩固革命人生观

在实践中,我逐渐明确,教社会发展史,不仅应向学员灌输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引导学员确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

一、二队的绝大部分学员,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些同志是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分田地、打土豪,大家有田种、有饭吃,所以热爱共产党,向往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教育的重点是引导他们进一步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懂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树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全人类求解放的观点,克服小农思想、平均主义。

针对他们文化低,知识面不广的实际,尽量采取形象化教学,并在学员中间提倡互帮、互学。我深入到他们中间,以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给他们补课,参加讨论,解答问题。有时一堂课讲三小时,课外辅导却要多用两三倍的时间。我耐心热情地给学员们以帮助,使学员们增强了信心。有了学习的兴趣,使原来枯燥的课堂,变成了活跃的学习场所,学员都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对我的信任程度也一天天高起来,大家都亲切地称

我为“罗教员”。

后来,我又被调到八队和四队教课。八队是女生队,大都是初中、高中学生,热情、活泼。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也只有20岁左右,大多为不愿当亡国奴,追求抗日、进步来的,也有少数人是为了逃婚或家庭不和而来的。学员文化水平虽然比较高,目光比较宽,但来自五湖四海,水平高低不一。在这里,我教社会发展史、统一战线,还讲妇女问题。为了做好工作,我干脆住在队里,同她们完全打成一片。

当教员,要取信于学员,必须言教身教并重。大约是1939年春,抗战形势紧张,日寇的飞机轮番轰炸我们的驻地。于是,教员总队加紧了军事训练。本来,政治教员早晨不出操,此时却规定一律集中操练。我住在八队,离操练场地有几里路,每天,晨曦朦胧,学员们还没起床,我就起了床,背上背包、手榴弹,赶到集合地上操,一次也没有掉队。晚上,学员们都已入了梦乡,我还挑灯夜读,备课。由于队长、指导员、排长、班长、教育干事,人人以身作则,加上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课、军事锻炼等综合教育充分发挥作用,学员们的“小姐脾气”、“学生腔”逐渐消失了,个个晒得黑黑的,练得壮壮的,立志革命,会打靶,会做野外军事动作,成为合格的军人。

四队,全体学员是男同志。我已经习惯了军事生活,同志们也觉得我可以同他们一起生活,所以同意我也住在队里。这个队的学员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工人,对学习的要求特别迫切。当他们经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后,了解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及其必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学习兴趣特别高,信心特别强。他们说:“穷哥儿们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拿起枪杆子干革命,才有出头的日子!”